

# 基于家庭生命历程的北京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研究

柴宏博,冯 健\*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研究是解读郊区空间的重要方面之一,当前的研究多基于汇总的个体数据,从家庭层面出发的微观研究较少。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居住在北京五环至六环之间的3个不同类型的家庭开展实证研究,旨在通过以家庭为单元的行为空间研究,丰富对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的理解。研究发现:家庭的生命历程与家庭成员的日常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生命事件,包括迁居、就业选择、家庭结构变化、家内成员的社会角色变化等,会通过改变地理背景、移动性和家庭内部的责任分工,影响每一个成员的惯常活动模式。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时间安排形成了家庭成员一段时间内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但当部分因素改变时,家庭也会通过一定的协调机制来响应家庭成员所遇到的制约,以便家庭成员能够更好的完成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活动。

**关键词:**家庭;生命历程;生命事件;行为空间;郊区;北京

## 1 引言

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居民日常生活也愈发多元化。家庭是城市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居民的居住和生活都是以家庭为单元进行的。家庭对个体行为空间存在重要影响,家庭情况(如家庭规模、结构及收入等)构成个体行为空间的重要背景,并影响每个成员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同样具有相互影响、关联及互动的关系,比如在某些决策上的矛盾和协商(negotiation)。随着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现代社会的家庭类型更加多元化,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生育意愿的降低、家内角色的调整等均影响到家内成员的生活方式。在多元化家庭背景影响下,个体与其他家庭成员、个体与家以外其他人的关系、个体对城市空间的利用都发生了变化,个体生命历程和行为空间更加复杂化,个体间行为空间的差异更加明显。从家庭的视角出发,分析居民行为空间,有助于更好地解释个体间行为差异,

并分析其行为机制。而郊区空间作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社会空间高度异质化、复杂化的特点,往往意味着对个体行为更强的制约,而在这种制约下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互动过程也更为紧密。因此,以家庭为单位分析郊区居民的行为空间更为必要。

目前,从家庭视角出发的时空行为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分析家庭内部责任分工对个体决策和时间利用的影响。有学者提出了家庭责任假说,认为由于家庭分工和照料责任的不同,女性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固定性制约,家庭照料责任直接影响到就业决策(Johnston-Anumonwo, 1992),其中对全职就业的女性影响最大,直接制约了其潜在活动机会和可达性范围,甚至需要牺牲工作活动时间来进行家务劳动(Kwan, 1999a, 1999b)。二是基于活动移动行为,分析家庭角色对个体移动性影响的性别差异。认为女性在家庭中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直接制约其移动性(Kwan, 2000; Schwanen, 2007),女性会有更多的非工作出行(多为家务出行)和多目

收稿日期:2016-11;修订日期:2016-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157)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671157]。

作者简介:柴宏博(1991-),女,甘肃会宁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城市地理研究,E-mail: chaihbo103@gmail.com。

通讯作者:冯健(1975-),男,江苏沛县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地理研究,E-mail: fengjian@pku.edu.cn。

引用格式:柴宏博,冯健. 2016. 基于家庭生命历程的北京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35(12): 1506-1516. [Chai H B, Feng J. 2016. Behavior space of suburban residents in Beijing based on family life cours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12): 1506-1516.]. DOI: 10.18306/dlkxjz.2016.12.007

的出行,交通方式也更愿意选择公共交通,开车出行的频率较低(Hanson et al, 1980, 1981; Kwan, 2000; Crane, 2007; Hanson, 2010)。相较于男性,女性通常在家庭汽车支配权分配中处于劣势,移动性更低(Scheiner, 2012)。三是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对家庭内分工的影响。如对于当前占主流的核心家庭,往往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格局,女性承担了更多购物、家务劳动、抚育子女等家庭责任,直接制约其日常活动(Zuo et al, 2001; 张文佳等, 2008)。特别是有未成年孩子(尤其是哺育期的儿童)的家庭和未成年孩子较多的家庭中,孩子增加会使得女性在职业和家庭之间更多地选择向家庭倾斜(Schwanen et al, 2014)。相对于核心家庭,扩展家庭中老年人的加入有助于减少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的制约,而钟点工、保姆等社会照料服务的加入也有助于平衡家庭分工(Logan et al, 1998; Logan et al, 1999; Chen, 2005; Feng et al, 2013)。此外,还有关于家庭内部成员相互作用机制(比如可能产生的冲突或者活动上的联合)、家庭内不同成员的行为差异等主题(Dijst et al, 2000; Lee et al, 2007; Ren et al, 2009; Lee et al, 2011)的研究。本文重点关注家庭内决策、家庭结构及其变化对个体行为空间的影响。

个体的长期行为与短期行为在时间上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Hägerstrand, 1970, 1982; 塔娜等, 2016),家庭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柴彦威等(2013)将生命历程方法理论融入长期空间行为分

析中,有助于理解日常行为模式的变化过程。生命历程理论用轨迹、转折点、持续期等概念来描述社会变迁过程中个体的发展,强调生命事件对于个人的影响程度(王宇凡等, 2013)。其中转折点是个体生命事件发生变化的时间和方向(刘望保, 2015),针对家庭中作为转折点的重要生命事件的分析不仅可描述该事件前后2种状态的变化方向,还可以将事件状态的变化与社会环境、个体基本特征及其他重要事件的变化动态地关联起来。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典型案例,通过分析3对家庭重要生命事件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展现郊区居民行为空间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丰富对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的理解。

2 研究方法

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通过深度访谈、话语分析及叙事分析等方法,试图从长时间尺度关注郊区居民日常活动状态的转折过程、特定事件发生与家庭结构变化对个体日常活动的塑造,通过这种基于时序的、动态的组织方式,形成对个体移动性和时间利用的深入理解。

本文的受访对象包括8例居住在北京市五环至六环之间地区、且夫妻双方至少有一人拥有北京户口的家庭(表1),主要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方法,访谈对象包括所有已成年的家庭成员,数据采集于2015年12月-2016年3月。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

表1 调查样本基础情况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es

序号	家庭人数	家庭结构	年龄	住房情况	家庭基本情况
1	5	扩展家庭	男家长37岁 女家长35岁	自购房	双方均有就业,与男方父母同住,育有一子(2岁)
2	3	核心家庭	男家长46岁 女家长46岁	自购房	男方有就业,育有一女(16岁,高中在读)
3	3	核心家庭	男家长43岁 女家长43岁	自购房 2套住房	双方均有就业,育有一子(18岁,大学在读)
4	3	核心家庭	男家长40岁 女家长34岁	自购房	双方均有就业,育有一子(7岁,小学在读)
5	4	扩展家庭	男家长35岁 女家长35岁	自购房	双方均有就业,与女方母亲同住,育有一子(11岁,小学在读)
6	2	核心家庭	男家长34岁 女家长34岁	自购房	双方均有就业
7	2	核心家庭	男家长31岁 女家长31岁	租房	双方均有就业
8	3	核心家庭	男家长30岁 女家长31岁	自购房	双方均有就业,育有一女(7岁,小学在读),多与父母合住

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基础信息、生命史与职业史,家庭的迁居信息,居住社区及周边社会空间信息,并且请家内成员回溯了自己每一个重大生命事件发生前后惯常的活动数据,或者利用个体日记来获取其某一阶段典型一天的活动日志,刻画并分析其日常生活的变化。

不同的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及其他家庭类型特征共同影响到家庭决策、资源分配和劳动分工,直接影响家庭内成员的决策偏好和行为模式,特别是迁居等重要决策,直接关系到家庭内每一个成员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和移动。因此有必要对不同类型家庭在不同生命阶段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及其差异进行分析。目前,中国城市家庭结构正逐步由传统式大家庭转向核心家庭,但老年人加入并照料第三代的扩展家庭仍是当下众多家庭寻求工作与家庭平衡的方法之一。因此,本文分别选取了扩展家庭、已婚有子女家庭以及已婚无子女三类家庭的典型样本进行分析。在扩展家庭中,考虑到5号家庭中女方母亲迁入原因是配偶去世无人照料,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选择1号作为扩展家庭的典型样本。在核心家庭中,8号家庭由于女儿读书问题,多与父母合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相较于3、4、5、7号家庭,2号和6号家庭回溯的惯常活动数据更为详细,因此选择二者分别作为已婚有子女家庭及已婚无子女家庭的典型样本。并将1号家庭、2号家庭、6号家庭重新编号为1、2、3号样本。一个家庭中重要的生命事件可分为迁居就业等带来的职住变化、经济条件改变、家庭成员社会角色的转变及家庭结构的变化等几个方面,下文也将从这几方面

进行分析,以探究家庭重要生命事件对个体行为空间的影响。

### 3 结果与分析

#### 3.1 样本家庭的职住空间互动

家庭和单位是居民时空间路径中的2个重要停留点,除工作和家务外,居民其余大部分活动也都是围绕着这2个停留点展开。因此,居住空间和工作空间作为日常活动最重要的空间构成,其在家庭生命历程中的变化过程及互动,也反映了居民行为空间的变化过程。通过基于家庭生命历程的分析,可把握人的一生中不同生命事件的关联关系,分析迁居机制、行为的时空间制约等居民行为空间的变迁机制与过程。其中在时空间制约方面,不同长期行为的制约因素有较大的差异,且与短期行为明显不同。就迁居行为而言,能力制约、组合制约、权威制约都有较大影响。

3个样本家庭的行为空间变化分别经历了3种不同的历程(图1):工作地不变,居住地变化(1、2号家庭);居住地不变,工作地变化(3号家庭男家长);居住地随工作地变化(3号家庭女家长)。

当工作空间固定,居住空间不稳定时,出于通勤成本的考量,个体会自发地寻求最适合自己经济条件和通勤时间的居住空间,迁居行为受到收入等能力制约和单位制度、住房歧视、户口等组成的权威制约。以1号家庭为例,男女家长均属于工作地不变,居住空间围绕工作地变化。早年,男家长的居住空间并不稳定,随着城市空间的变化而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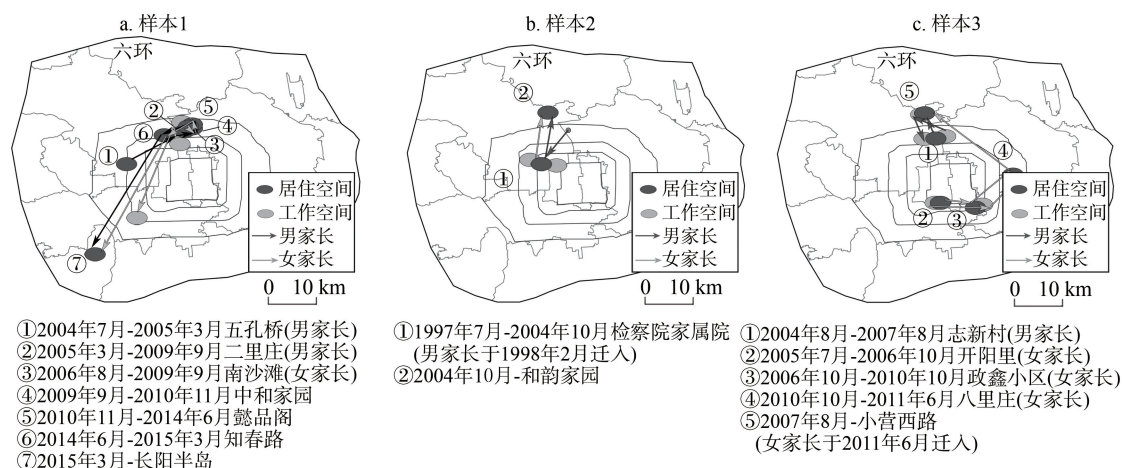


图1 3个样本家庭中男女家长居住空间与就业空间变化

Fig.1 Changes in living space and working space of the couples in three sample families



其迁居行为决策受到个人收入的制约。但当居住空间较为固定(特别是购房后)时,工作地点改变带来的通勤成本远小于改变住房的成本。因此这种市场机制导向下的工作空间变动,一般并不会影响其居住空间的变化,只会带来其日常行为模式的调整。比如3号家庭中男家长,在购买第一套住房后经历了2次工作变动,但由于通勤成本较小,以选择改变通勤方式适应变化,日常活动依旧围绕居住空间展开。

当居住空间和工作空间都不固定时,未婚个体会自发寻求最适合自己经济条件和通勤时间的居住空间,居住空间跟随工作空间变化。这种职住相依型是制度和市场作用下最普遍、最经济的空间组合模式。3号家庭的女家长未婚时出于通勤成本的考量,其迁居决策既受到收入和日常行为连续性需求的能力制约,也受到工作单位时间制度等组成的权威制约。但婚后在选择住房时,整个家庭的迁居决策更多地受家庭关系、代际照顾、生活必须的住房设施等构成的因素组合制约。如1号家庭生育后的迁居决策,是考量了夫妻二人的通勤距离和时间安排、迁入小区能否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求、未来教育子女的需求以及房屋面积能否满足整个家庭等问题后作出的选择。

总之,不同的制约影响了家庭的迁居行为和行为空间变化。在迁居行为中,权威制约的影响最为显著,而由于空间演变、社会变迁、技术进步、个体成长,制约本身也会发生改变,需要加入历史年代、年龄等因素。

### 3.2 迁居行为对个体日常行为空间的影响

#### 3.2.1 家庭迁居决策对个体日常行为空间的影响

城市住房和居住空间是日常生活的基础条件,同样也是一个家庭根据家庭结构变化和收入作出

的重要生命决策的结果。家庭迁居决策往往是家庭内成员之间协商妥协的结果,而整个家庭选择了居住地点后,相当于选择了居民在城市中生活必须要面临的地理背景因素,直接影响到每一个成员潜在的活动参与和出行。个体选择交通方式、出行路线以及是否进行其他非工作活动都直接受到这个地理背景的制约。

以1号家庭为例,该家庭的迁居决策受到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而家庭迁居决策导致居住空间的改变,使得该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空间与模式发生更大的改变。1号家庭男家长的第2次迁居(图2a)发生在1号家庭男女家长相识一年后,两人开始同居,合租地点选择为接近女家长工作单位的社区。此时该样本的通勤距离较之前有所增加,通勤方式仍然保持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相结合。但下班后家内活动时间明显增加,日常活动也多为以家庭为中心的就近活动,比如饭后外出散步或运动。非工作日活动内容以休闲和购物为主,从时间上看,早晨基本以家内事务为主,中午会有少量外出就餐,下午主要是家附近的休闲和购物,晚上几乎没有家外非工作活动。如果有远距离非工作活动,时间安排上会相应调整。

1号家庭男家长的第5次迁居发生在该家庭女家长怀孕后。由于女家长需要照料,男家长的母亲也来到北京,家庭结构改变、家庭人口增加和旧居空间较小的矛盾促使1号家庭的夫妇二人决定购买新居。而新居的位置则综合考虑了房屋面积与价格、女家长工作地点的变动、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及周边教育、医疗设施情况,最终选择为距离女家长工作地较近的社区。正式迁入新居后,1号家庭的家庭结构也由原来的核心家庭变为扩展型家庭。家庭结构和居住空间的改变同时影响了该样本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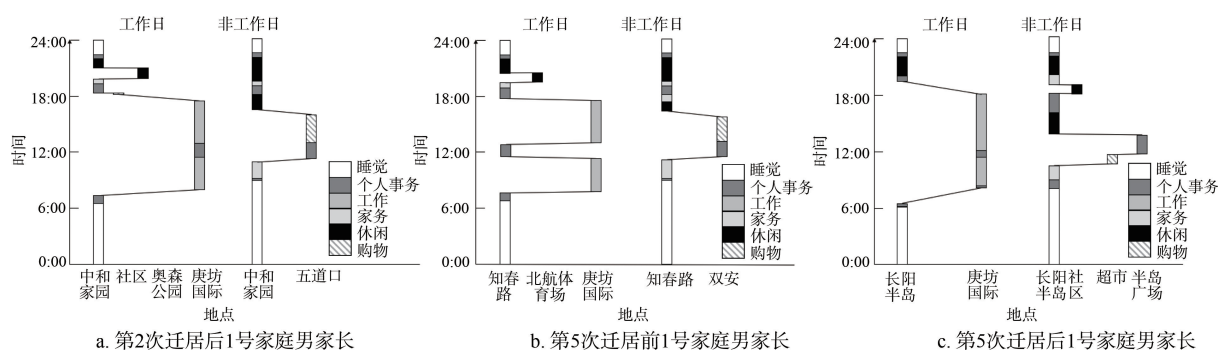


图2 迁居对家庭日常活动路径的影响

Fig.2 Influence of relocation on the daily activity path of a male household head



常活动空间的变化(图2b-2c)。由于通勤距离明显增加,男家长由职住接近型变为长距离通勤型,每日通勤的总时间接近3小时,通勤方式以地铁为主。早晨较早出门,工作时间比较长,整个白天几乎都在市中心工作,晚上回家较晚,回家后的外出活动较少。上午的非工作活动主要多发生在上班路上,以单位附近短时间的就餐活动为主;中午的非工作活动最多,以工作地附近的外出就餐为主,也有少量休闲活动;晚上的非工作活动主要集中在晚饭或晚饭后,以远距离休闲和家附近的就餐活动为主,工作日的购物活动很少。而休息日,基本以在家附近活动为主,偶尔会有半天左右的外出活动到城市中心或者远郊区,以休闲和购物活动为主。

### 3.2.2 职住关系变化对个体惯常活动模式的影响

迁居行为作为重要的居住行为之一,通过改变家庭的居住空间影响家内个体的职住关系。城市职住空间直接关系到家庭获得设施与服务的可达性,职住关系的变化带来地理背景的改变,制约家内成员从事不同日常活动或组合的机会。1号和3号家庭中男家长几次惯常活动模式的调整,均与个

体职住空间的变化有关。

1号家庭中的男家长(图3a-3b)在第1次迁居前,与他人共同居住在公司提供的职工宿舍,条件简陋且对个体活动限制较多。此时该样本的日常活动基本围绕工作地展开,与工作空间完全重叠,居住地仅有少量休闲活动,且多位于室内。工作日其活动空间和工作空间重合,对时间的利用较为规律,通勤方式以公共交通为主;而非工作日以休闲活动为主,活动范围较大,基本以城市中心和远郊区风景区为主,其生活方式属于“活动分布集中、出行活跃”型(塔娜等,2015)。迁居后,样本虽然仍与朋友合租,但迁居后职住接近带来通勤距离降低、居住条件提升、周边设施利用更为便捷,使得样本日常活动空间向居住空间倾斜,家内活动时间增加,非工作日也会有家附近区域的外出活动,且日常活动空间范围略有扩大,通勤方式改为自行车与公共交通相结合。

而3号家庭的男家长(图3c-3d)在迁居前同样与他人合租,距离公司地点较近,日常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基本重叠,通勤方式以自行车和公共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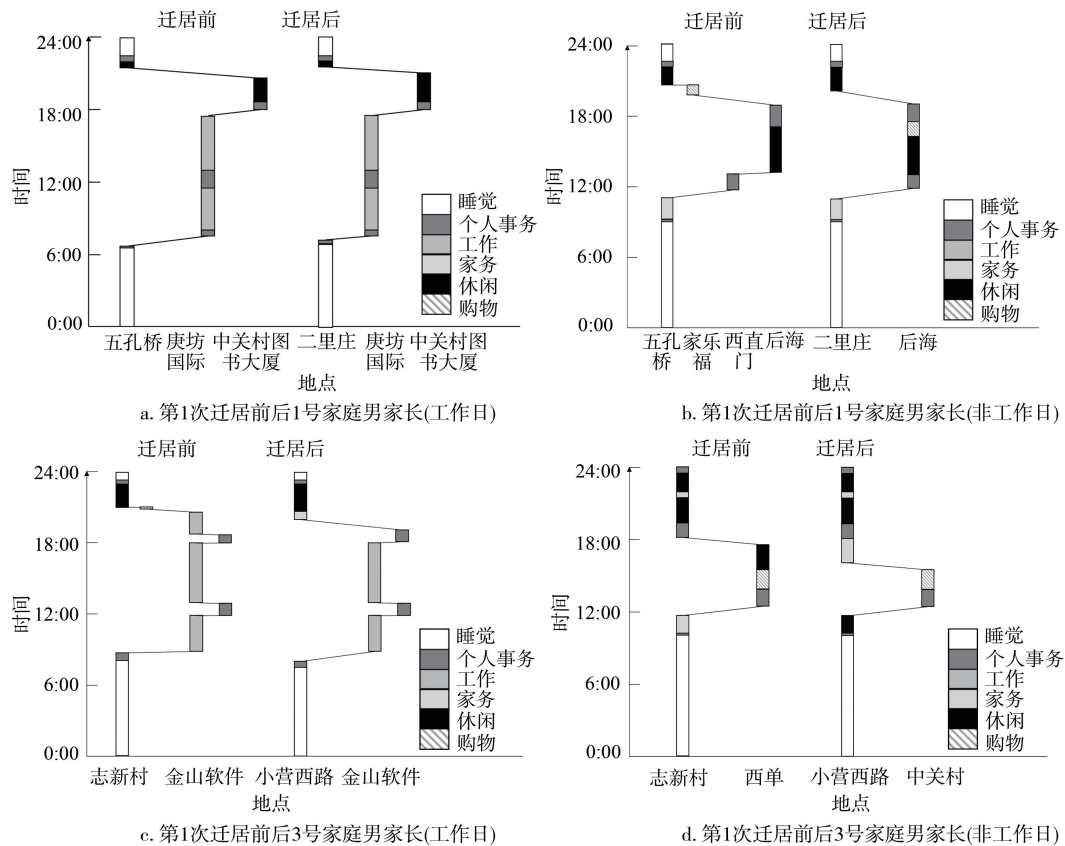


图3 职住关系对日常活动路径的影响

Fig.3 Influence of jobs-housing relationship on the daily activity path of two male household heads

为主。非工作日则以家内活动为主,活动范围较小,外出活动多为指向城市中心的远距离休闲、购物、就餐等。而在购房后,由于通勤距离的增加,其通勤方式也改为地铁和公交等公共交通出行。每日通勤时间增加,出行类型也更倾向于多目的单次出行,在通勤途中完成就餐、购物等活动,非工作日户外活动减少,非工作日活动仍以家内活动为主。该样本第2次惯常活动模式的变动发生在工作地变动后,由于公司搬迁使得该样本又一次回到职住接近状态,得益于公司灵活的时间制度,其在时间利用上的弹性也更高,日常下班回家后再外出进行家外非工作活动的情况增多。由于社区餐饮设施、服务设施、休闲设施和零售商业设施密度不足等原因,家外休闲活动距离明显增加,非工作日仍以家内活动为主。

### 3.3 经济与社会角色对个体日常行为空间的影响

社会性既赋予了个体不同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也限制了个体必须要在一定的家庭或者其他组织中承担责任。其中经济条件改变主要影响到家庭的移动性和休闲活动,而家庭中长期性的社会角色变化直接影响到个体的日常活动安排。

#### 3.3.1 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变化对个体行为空间的影响

升职带来社会地位的变化,对个体日常行为空间的直接影响不明显。1号和2号家庭中男家长升职前后的日常活动路径基本没有变化。但长期来看,社会地位的提升改变了家庭的经济条件,进而影响到家庭的移动性和休闲活动等。

随着私人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小汽车已日渐成为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家庭经济条件的提升使得居民有能力购买小汽车,从而改变自己或配偶的移动性。拥有汽车增加了居民的就业可达性和通勤相关的移动性,不同汽车所有权、汽车驾驶权的家庭时空路径具有差异性,家内对汽车的使用也存在性别差异。2号家庭购买小汽车后由男家长驾驶,工作日他的活动空间较没有车时略有收缩,因为在获得汽车驾驶权的同时他也需要承担起家庭中接送孩子的职责,表现出明显的近家趋势。而休息日小汽车的使用扩大了家庭的休闲活动范围,有能力进行远距离活动,活动空间显著增加。在时间安排上,该样本在一周的时间范围内会根据汽车限号政策组织日常活动。除移动性增加扩大了家庭的休闲空间外,经济条件的改变也

会影响其休闲方式。以1号家庭的男家长为例,在家中安装网络后,其工作日每晚的休闲活动直接由家外转为家内,以浏览网络、观看视频和游戏为主,基本没有户外活动,活动空间由物质的实体空间向网络虚拟空间转变。

#### 3.3.2 家内个体社会角色变化对个体惯常活动模式的影响

当家庭中个体的社会角色由儿女转变为丈夫、妻子直至父母时,其所需承担的责任也随之增加。这类长期性角色的变化同样影响到个体惯常活动模式。

(1) 从单身到婚姻。在3号家庭中,未婚时,女家长的居住空间随工作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图4a),尽管每次都是被动地跟随就业地的变化而迁居,但一直定位在职住较为接近的状态。通勤方式以公共交通为主且时间较短,具有明显的近距离通勤特征,日常生活空间与就业空间重合,具有本地指向的特征(塔娜等, 2015)。工作日的非工作活动多以围绕工作地周边的购物、用餐为主;非工作日的休闲活动范围较广,多为上午10点以后出发,指向城市中心的购物中心。婚后,由于家庭住房是男家长在婚前购买的,距离女家长工作地较远,但再次迁居的成本过高且家庭无力负担,该样本只能妥协并改变自己的惯常活动模式(图4b)。此时该样本通勤距离明显增加,每日通勤时长在2~3小时,通勤特征表现为早出、晚归、向城市中心长距离公共交通通勤。其工作日活动安排受到工作活动的显著制约,整日工作时间较长,几乎整个白天都在工作地,非工作活动以早通勤路上的就餐和工作地附近的外出就餐为主,偶尔有少量休闲活动,晚上回家较晚,到家后以家内休闲活动为主,极少进行家外活动。非工作日活动内容和男家长一致,以休闲和购物为主,多指向家周边的购物中心和远郊区。

(2) 从妻子到母亲。在1号家庭中,女家长的社会角色就经过了从妻子到母亲的变化,社会角色变化带来了转折点前后日常生活行为的改变。结婚前,与3号家庭女家长相似,由于职住距离接近,工作日有较为明显的近距离通勤的特征,非工作时间的休闲活动多指向邻近的城市商业区域(图4c),休息日活动以家内活动为主,偶尔有指向城市中心的购物娱乐活动。结婚后女家长的生活模式改为家庭责任优先型(图4d),工作日的时空路径收缩,几乎围绕在家周边,相较于男家长晚上回家更早且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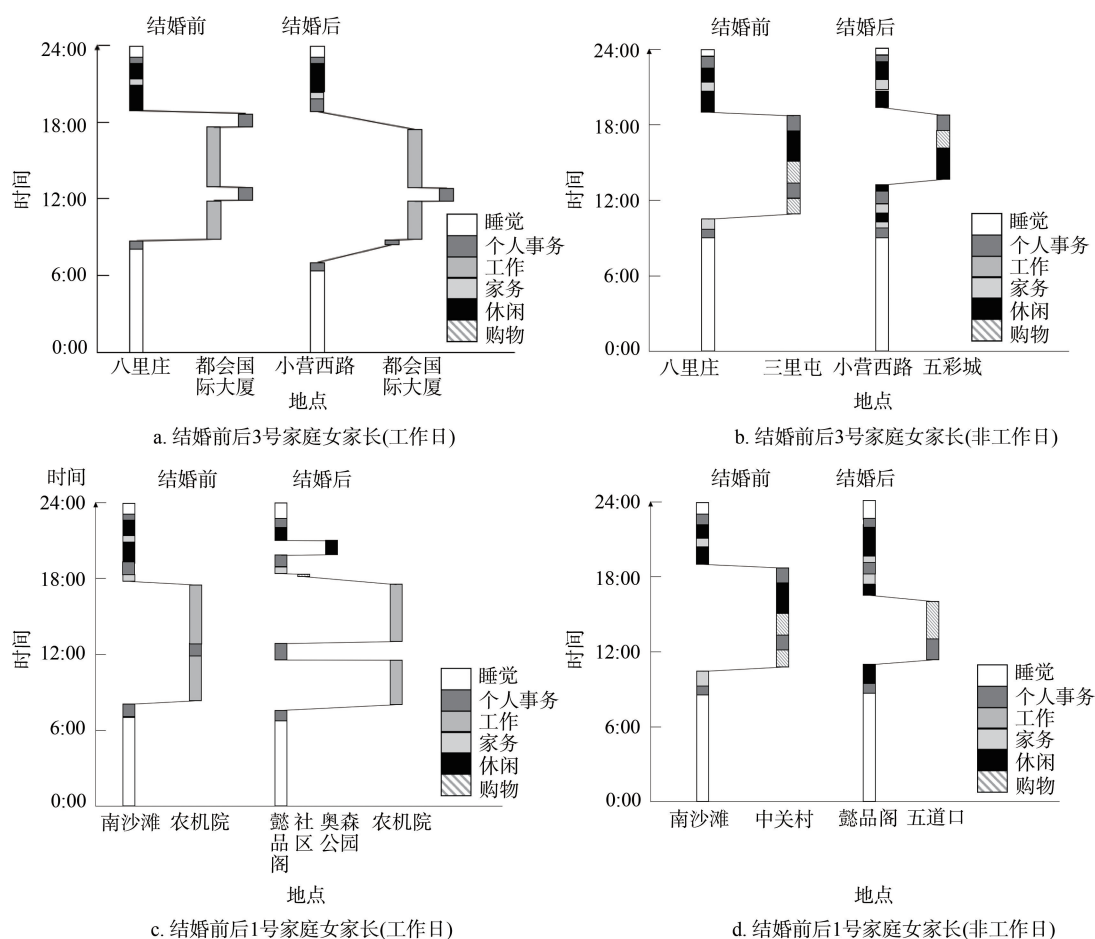


图4 经济和社会角色变化对家庭日常活动路径的影响

Fig.4 Influence of chang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roles on the daily activity path of two female household heads

后的外出活动较少。其工作日的日常活动则受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双重制约,非工作活动少且集中在家附近,以其他非工作活动(家务、个人事务、联络等)为主;休息日也几乎以在家内活动为主,家外活动以家为圆心向四周距离衰减分布,非工作活动相对较少,外出活动主要以家附近和远距离商业中心为主。生子后,由于单位安排,1号家庭中女家长的工作地点更换至丰台科技园,工作空间和居住空间同时发生改变,但对该样本的影响不大。家庭成员的增加给她带来更多的哺育小孩的压力,依旧保持为家庭责任优先型。为方便照料,该家庭购置了小汽车并由女家长使用,其移动性有所增加,在通勤过程中进行家外非工作活动的比例较小,偶尔也会进行回家后的家外非工作活动以弥补通勤过程中的可达性制约。

### 3.4 家庭结构变化对日常活动的影响

是否结婚、是否有小孩、是否与老年人合居这些家庭生命周期因素,以及家庭中的个体角色与地

位等主观因素共同决定了个体所处的家庭类型特征,是单身家庭、已婚无子女家庭、已婚有子女核心家庭还是已婚有子女扩展家庭等类型,既决定了家庭中个体能获得的资源和帮助,也决定了个体是否受到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制约。一个家庭中的责任分工和时间分配同样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就业选择,有必要关注于核心家庭、扩展家庭男女家长在时空制约和行为模式上的差异。

#### 3.4.1 双职工家庭:以可支配时间为核心的责任分工

在双职工家庭中,其责任分工以夫妻双方的可支配时间为核心,夫妻二人均受到就业和家庭责任的双重影响,其中受时空制约较小的成员更倾向于承担更多的家务。因此,男女家长之间的工作与通勤活动安排直接影响家务劳动分工模式。在3号家庭中,由于女家长自身通勤和工作时间较长,该家庭责任分工更倾向于非传统的劳动分工,即工作日由男家长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反之,非工作日,女家长会承担更多的家内家务活动且家内休闲活



动时间明显小于男家长。

由于男家长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活动,其工作日回家后再外出进行家外非工作活动比例下降,晚通勤中会有一定的购物活动(图 5a),家内活动时间明显增加,日常活动也多为就近活动。非工作日活动内容以休闲和购物为主,多指向家周边的购物中心或远郊区。在这期间,男家长就业地再一次发生变动(图 5b),通勤距离随之拉长。但由于男家长工作时间弹性强,且相较于女家长职住距离较近,该样本的家内分工基本没有变化,男家长依然是家中家务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但回家后再外出的活动极少,晚上几乎没有家外非工作活动。说明在通勤距离增加后,个体需要压缩其可支配时间以完成家庭责任。

### 3.4.2 成长型家庭:随家庭生命周期变化受到更多的时空制约

家庭生命周期通常由家庭规模(家庭成员总数)、年龄、婚姻状况以及家庭中孩子出现及其年龄等维度决定。尤其是孩子的出现会对家长的活动

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有小孩的双职工家庭来说,就业压力与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正成为影响大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子女出生后,核心家庭成员受到更多时空上的制约。

以2号家庭为例,女家长结婚前,职住空间接近(图 5c),非工作时间的休闲活动多在居住地周边。婚后由于男家长尚有学业在读,女家长承担了更多家务分工,工作日的时空路径收缩,非工作日也以家内活动为主,家外活动多集中在家附近,偶有少量远距离出行。生育后,出于哺育小孩的压力,女家长行为决策更多地考虑家庭责任,工作日的时空路径更为收缩,在通勤过程中基本没有家外非工作活动,下班回家后也以家内活动为主。以照顾女儿为核心的家务活动成为女家长在家内的主要活动,个人休闲时间受到极大的挤压。这段时间里,女家长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料责任,其家庭分工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也展现出明显的日常活动模式的性别差异。

迁入新居后到辞职前这段时间,由于通勤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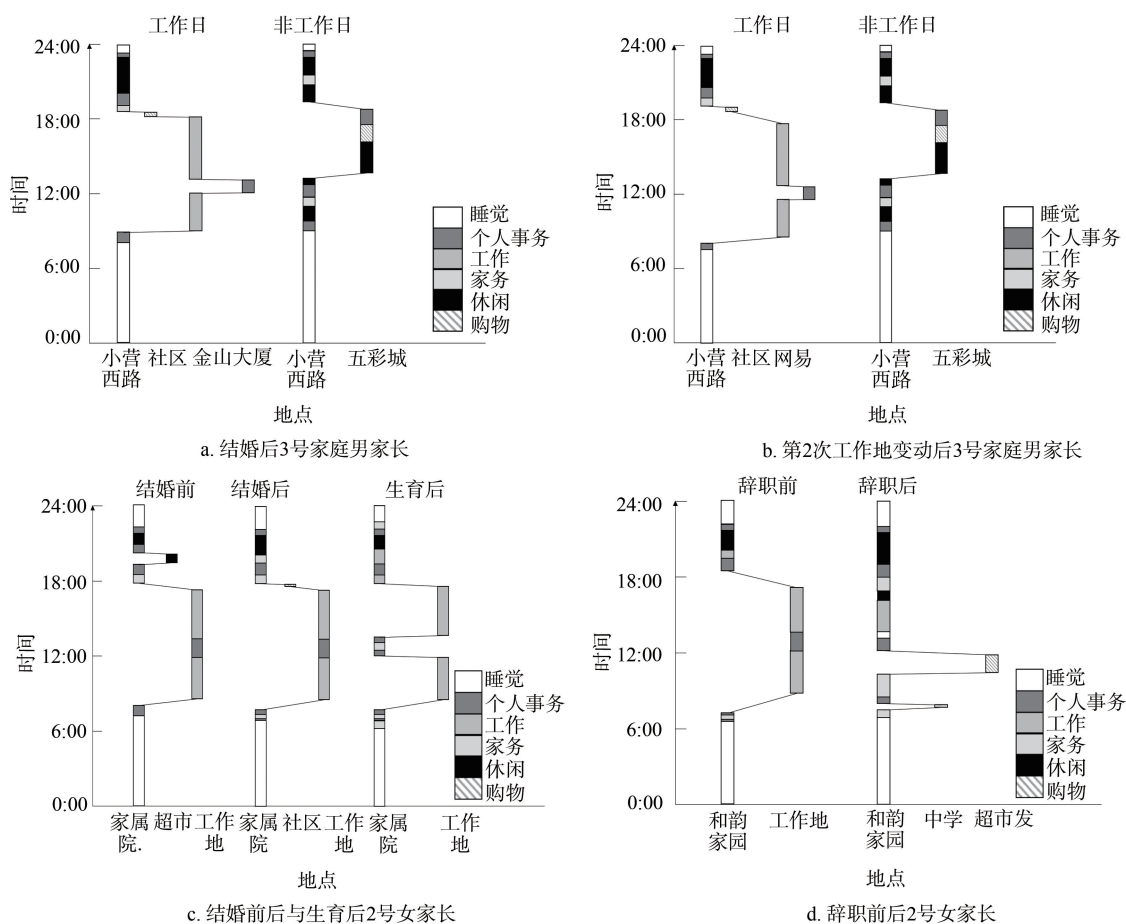


图5 家庭结构变化对家庭日常活动路径的影响

Fig.5 Influence of change in family structure on the daily activity path of two families

增加,女家长的通勤方式改变,通勤时间增长,工作时间较长,整个白天几乎都在市中心工作。此时与3号家庭类似,2号家庭会综合考虑夫妻二人工作单位的时间制度和弹性进行家庭责任分工,比如由男家长负责接送女儿,女家长负责做饭等家务劳动。回家后几乎不会再外出进行家外非工作活动,日常活动也多以家周边、社区内为主。

2号家庭女儿升入重点高中后,出于个人职业发展和照顾女儿学业的考虑,女家长选择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此时该样本白天时间安排弹性更大,也相应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和送女儿上学的工作,接女儿放学的任务仍由男家长下班后负责(图5d)。个人时间安排一定程度上受中学时间制度的制约。

### 3.4.3 扩展型家庭:老年人加入带来的时空间弹性

当家庭成员过多时,家庭也可以从扩展家庭成员(如父母、岳父母、兄弟姐妹)那里寻求帮助,扩展家庭成员的参与会影响家庭责任分工的性别差异,改变男女家长的行为模式。而在中国城市老年人生命历程中,由于子女工作忙碌,老年人往往代替了“保姆”角色,在第三代具有较强独立能力前承担起其照料责任,形成特定阶段典型的家外移动性与日常生活模式。在扩展型家庭中,工作日老年人的加入减轻了家务和照料小孩的负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弹性来进行自由活动。这使得夫妻双方都感受到更少的时空制约,并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时间。

1号家庭中的老年人生活空间完全围绕第三代展开,老年人的参与对于女性的帮助明显,但这种帮助似乎对减少男家长的时间制约作用更大,提高了参与时间更加灵活的活动的可能性。如1号家庭中男家长,虽然迁居后其通勤时间增加,但由于父母承担了工作日大部分家务劳动和抚育责任,男家长活动安排基本不受影响,可有更多的时间安排工作。而在非工作日,老年人的帮助对于男女家长的时空制约的作用都很小,考虑到老年人本身也有照料的需求,周末在家的固定活动会有所增加。

## 4 结论与讨论

作为日常活动最重要的空间形式,职住空间的互动展现了家庭中个体行为空间的变化过程。个体的就业与迁居行为互动密切,并共同受到环境、个人及家庭因素影响,二者之间的互动带来地理背

景的改变与制约,从而影响个体从事不同日常任务最小化组合制约的机会。特别对郊区居民来说,当存在职住分离时,个体生活空间多围绕着居住空间和就业空间展开,休闲、购物等家外非工作活动空间向外扩展,构成郊区居民复合的生活空间特征。当新的工作安排或居住空间区位变化后,个体往往会根据实际需求改变日常活动的安排来适应外界环境变化,使个人的日常活动与所处的微环境节奏相协调,并通过完成新环境所允许的惯常活动维持本体安全感。当个体调整日常行为后的生活节奏与周边环境契合且被个体认可或被迫接受后,在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内这一新的日常行为方式会被延续下来固化为日常行为模式,直到为新的影响因素所改变。

在影响因素上,家庭生命事件的变化影响家庭中每个个体日常活动和整个家庭的活动秩序,但影响机制各有不同。社会地位的提升对个体日常活动路径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由此带来经济条件的改变会影响家庭的移动性和休闲方式。家庭中个体社会角色变化、家庭结构变化、职住空间变化一起对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分工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在通勤时间上,当男家长通勤距离长于女家长,家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的家庭分工;如果女家长工作时间较长,那么该家庭更倾向于非传统的劳动分工。在家庭结构上,没有小孩的已婚年轻家庭更可能选择非传统的分工模式,有子女的家庭中,女家长明显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扩展家庭中,中国城市家庭中的代际援助有助于城市已婚女性平衡就业与家庭生活。不同的家庭内部劳动分工进而影响男女家长日常行为并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总体上,工作日双职工家庭中男女家长外出活动模式及行为空间呈现出相似性。子女的诞生会增加女性家长的家庭照顾负担,扩展家庭中老年人的加入对此有所改善。尽管性别差异在不同家庭之间仍有差别,但家庭可以通过各种协调机制来改变和调整家庭成员的时空制约和行为模式,使其能够更好地完成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活动。郊区空间扩大了郊区居民在活动和出行方面的性别差异,但是家庭可以通过不同的家庭战略选择影响并协调家内成员的日常活动模式,帮助个体更好地进行应对。

在空间行为研究开展之初就默认了一个命题,那就是“人”是作为“社会人”而存在的,因而人的行

为空间或空间行为是洞察“社会”与“空间”关系的最为重要切入点之一。郊区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的形成及变化的作用机制分析,可以把握行为空间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家”是西方地理学者近年来较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封丹等, 2015)。作为人们生活中的核心空间和重要节点,家一方面是基于血缘的社会交往的主要空间,为家内成员提供基本的保护和安全感,以及情感依托(赵莹等, 2013);另一方面,家庭中固定的资源利用、空间配置和时间配置,以及成员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家庭成员相对固定的行为秩序(Ellegård K et al, 2004)。对家庭的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更加细致的理解个体行为空间与物质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并对相关规划提供参考意见。本文尝试结合生命历程理论,通过叙事分析方法将家庭对个体空间行为的影响放大并加以分析,下一步工作会进一步研究家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互动过程,讨论社会空间中家的意义。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柴彦威, 塔娜, 张艳. 2013. 融入生命历程理论、面向长期空间行为的时间地理学再思考[J]. 人文地理, 28(2): 1-6. [Chai Y W, Ta N, Zhang Y. 2013. Rethinking time-geography in long-term space-time behavior study: Integrating with life course theory[J]. Human Geography, 28(2): 1-6.]
- 封丹, 李鹏, 朱竑. 2015. 国外“家”的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启示[J]. 地理科学进展, 34(7): 809-817. [Feng D, Li P, Zhu H. 2015. Progress in geographic studies on "hom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4(7): 809-817.]
- 刘望保. 2015. 生命历程理论及其在长期空间行为研究中的应用[J]. 人文地理, 30(2): 1-6. [Liu W B. 2015. Life course paradigm and its applications for long-term spatial behavior[J]. Human Geography, 30(2): 1-6.]
- 塔娜, 柴彦威, 关美宝. 2015. 北京郊区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与空间—行为互动[J]. 地理学报, 70(8): 1271-1280. [Ta N, Chai Y W, Kwan M P. 2015. Suburbanization, daily lifestyle and space-behavior interaction in Beijing[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8): 1271-1280.]
- 塔娜, 申悦, 柴彦威. 2016. 生活方式视角下的时空行为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35(10): 1279-1287. [Ta N, Shen Y, Chai Y W. 2016. Progress in research from a lifestyle perspective of space-time behavior[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10): 1279-1287.]
- 王宇凡, 冯健. 2013. 基于生命历程视角的郊区居民迁居行为重构: 以北京回龙观居住区为例[J]. 人文地理, 28(3): 34-41, 50. [Wang Y F, Feng J. 2013. Restructuring of suburban residents' intra-urban migration behavior based on life course: A case study of Huilongguan Community in Beijing[J]. Human Geography, 28(3): 34-41, 50.]
- 张文佳, 柴彦威. 2008. 基于家庭的居民出行需求理论与验证模型[J]. 地理学报, 63(12): 1246-1256. [Zhang W J, Chai Y W. 2008. Theories and confirmed model of urban resident's travel demand: Considering intra-household interactio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3(12): 1246-1256.]
- 赵莹, 柴彦威, Martin Dijst. 2013. 家空间与家庭关系的活动—移动行为透视: 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J]. 地理研究, 32(6): 1068-1076. [Zhao Y, Chai Y W, Dijst M. 2013. Home,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activity-travel behavior based 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2(6): 1068-1076.]
- Chen F. 2005. Residential patterns of parents and their married childr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life course approach[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4(2): 125-148.
- Crane R. 2007. Is there a quiet revolution in women's travel: Revisiting the gender gap in commuti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73(3): 298-316.
- Dijst M, Vidakovic V. 2000. Travel time ratio: The key factor of spatial reach[J]. Transportation, 27(2): 179-199.
- Ellegård K, Vilhelmson B. 2004. Home as a pocket of local order: Everyday activities and the friction of distance[J]. Geografiska Annaler: Human Geography, 86(4): 281-296.
- Feng J X, Dijst M, Wissink B, et al. 2013. The impacts of household structure on the travel behaviour of seniors and young parents in China[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30: 117-126.
- Hägerstrand T. 1970.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 [J]. 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24(1): 6-21.
- Hägerstrand T. 1982. Diorama, path and project[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73(6): 323-339.
- Hanson S. 2010. Gender and mobility: New approaches for informing sustainability[J]. Gender, Place & Culture: A Journal of Feminist Geography, 17(1): 5-23.
- Hanson S, Hanson P. 1980. Gender and urban activity patterns in Uppsala, Sweden[J]. Geographical Review, 70(3): 291-299.
- Hanson S, Hanson P. 1981. The travel-activity patterns of urban residents: Dimensions and relationships to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J]. Economic Geography, 57(4): 332-347.
- Johnston-Anumonwo I. 1992. The influence of household type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work trip distance[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4(2): 161-169.



- Kwan M P. 1999a. Gender and individual access to urban opportunities: A study using space-time measures[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1(2): 211-227.
- Kwan M P. 1999b. Gender, the home-work link, and space-time patterns of nonemployment activities[J]. *Economic Geography*, 75(4): 370-394.
- Kwan M P. 2000. Analysis of human spatial behavior in a GIS environment: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ystems*, 2(1): 85-90.
- Lee H J, Goss R C, Beamish J O. 2007. Influence of lifestyle on housing preferences of multifamily housing residents [J]. *Housing & Society*, 34(1): 11-30.
- Lee J Y, Kwan M P. 2011. Visualisation of socio-spatial isolation based on human activity pattern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space-time[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02(4): 468-485.
- Logan J R, Bian F Q. 1999. Family values and coresidence with married children in urban China[J]. *Social Forces*, 77(4): 1253-1282.
- Logan J R, Bian F Q, Bian Y J. 1998.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urban Chinese family: The cas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J]. *Social Forces*, 76(3): 851-882.
- Ren F, Kwan M P. 2009.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human activity-travel patterns: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using 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17(6): 440-450.
- Scheiner J, Holz-Rau C. 2012. Gendered travel mode choice: A focus on car deficient households[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4: 250-261.
- Schwanen T. 2007.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auffeuring children among dual-earner families[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9(4): 447-462.
- Schwanen T, Kwan M P, Ren F. 2014. The Internet and the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ur[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80(1): 52-64.
- Zuo J P, Bian Y J. 2001. Gendered resources,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perceived fairness: A case in urban China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3(4): 1122-1133.

## Behavior space of suburban residents in Beijing based on family life course

CHAI Hongbo, FENG Jian\*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suburb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spa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behavior space of suburban residents, we can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havior space and urban space. Existing studies about behavior space of suburban residents pay much attention to aggregated data based on individuals but little attention is paid to family units. This study used family as a basic unit to explain the micro-level behavior space of suburban residents. It chose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families as cases, which all lived between the fifth and the sixth ring roads of Beijing. By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we analyzed the important life events in their life courses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ir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s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fe course and the daily behavior of each individual in these families. Migration and changes of individuals' employment, social role in a family, and family structure are all important life events of a family. The influences of these events are in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the interaction of home-work space constrains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family memb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anges of job-housing relationship and family structure influence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 Different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 also affects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male and female parents. Although gender differences are still existing and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families, a family can influence and coordinate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the family members through different strategies. Suburban space expands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activity and mobility of individuals, but family, as a coordination mechanism, can help individuals to cope better.

**Key words:** family; life-course theory; life event; behavior space; suburban; Beijing